

# 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

谢雪花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不论是从年龄还是从文风上来看, 汪曾祺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文坛的一个特例, 是一个有意思而且有味道的个案。鉴于此, 通过分析其在 80 年代的创作中与传统方面的衔接, 发现汪曾祺的创作在单纯的文化品格、服务于“今世”的现实意义、“常有隐于民间”、真诚朴素而有回味的艺术美等四个方面受到传统文人归有光显明的影响。

[关键词] 汪曾祺; 归有光; 文化品格; 艺术美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229(2009)01-0106-02

汪曾祺在《谈风格》一文中说: “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 我想了想: 古人里是归有光……”<sup>[1] (11)</sup>

归有光身处嘉靖、隆庆之世, 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汪曾祺一样, 也是处于一个思想启蒙的变革时代。同 80 年代一样, 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这一历史阶段。同样都是处于历史变革期, 汪曾祺与归有光两者在文学上的成就都表现在创作上的独树一帜。汪曾祺受到归有光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文化品格。归有光所处的时代,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杠杆的市井文化不断丰富, 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王阳明心学为主的哲学呐喊, 更加速了这一影响的深刻性。老庄禅悦的佛光道影也在明中叶以后有了笼罩知识阶层的魅力。雅与俗在稍后于归有光时代的晚明小品中的沟通, 使古代散文有了新的面目。然而归有光的散文却与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大相径庭。归有光散文的文化品格较为单纯<sup>[2] (1)</sup>。

二是服务于“今世”的现实意义。“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 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山斋先生文集序》)“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 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 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 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 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 而出于吾心之理”。(《山舍示学者》)归有光根据自己学习古人文章的体会, 认识到文学是发展的, 学习古人的文章应该“有意于以神求之”。汪曾祺被誉为“传统的最后一抹斜阳”, 所说的就是他对传统的重

视和用与现世的文学理想。季红真在选编《汪曾祺小说》时说“他这一次亮相, 则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参与了中国小说的革命, 衔接起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的诸多传统。”<sup>[3]</sup>

三是“常有隐于民间”。归有光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从他的文集中可看出他受儒家的影响很深, 是一个关心时事, 关心社会问题, 同情弱者的入世之士。于国民深怀忧患意识, 是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归有光在《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一文中道: “其于天下之利害, 生民之得失, 常有隐忧于民间。”吴纯甫本是一位风流才子, 却能与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归有光结成忘年交, 其基础就在于二人有“为世道无穷之虑”的忧患意识的存在。

汪曾祺一直声称自己的写作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世间小儿女、平民弱者的深切同情。他与归有光一样, 文化品格都没有启蒙或思想解放的色彩。汪曾祺曾经在自选集的自序里说: “我写不了象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 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sup>[4] (自序)</sup>他还常说: “但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他以淡淡的苦味关怀现世, 溶古于今, 以今承古, 文字充满了苦味的温馨。他说, “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的。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层的, 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 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 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我写的人物, 有一些是可笑的, 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 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

\*[收稿日期] 2008-11-04

[作者简介] 谢雪花(1980-), 女, 福建泉州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尖刻。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sup>[1] (223)</sup>

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状》中的云致秋是个悲惨的小人物,作者的笔致是对他怀有同情之心的,但也并不显露。在娓娓道来云致秋的人生几个阶段后,结尾写到云致秋死后,追悼会完毕,“天很晴朗,我坐在回去的汽车里,听见一个演员说了一句什么笑话,车里一半人都笑了起来。我不禁想起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作者的特别之处是他不将这种悲哀泄流开来,而是紧接一笔转折:“不过,在云致秋的追悼会后说说笑话,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是很自然的。”

有人曾经问过汪曾祺,他那么多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他回答“随遇而安”。“随遇而安”的思想在汪曾祺对云致秋的笔至也可看出。其实文章结尾这一笔貌似无所谓的转笔,更添了云致秋一生的悲哀,作者的同情溢于言表。最后,汪曾祺再添一笔:“一个人死了,还会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错”。

这真的是“随遇而安”,真的是“不在乎”吗?往往说不在乎的人反而是在乎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就了汪曾祺的如此心态,再加上他大部分写作都是在晚年时期,心态趋于平和,当然其间也有他自觉的艺术要求。他认为,“抒情,不要流于感伤。”<sup>[1] (33)</sup>“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sup>[1] (33)</sup>这些都是他对艺术创作的自觉要求。而他也说过,“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sup>[4] (551)</sup>“‘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sup>[4] (551)</sup>从汪曾祺自己的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分明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关心平民大众,同情不幸遭遇的小人物的一位知识分子。

在汪曾祺的笔下,不论是《故里杂记》中的侏儒奶,还是《岁寒三友》里的三个人物,抑或是《大淖记事》里的小锡匠十一子、《皮凤三榷房子》里的高大头等等,都是一些受现实压迫的小人物。汪曾祺写他们,一件件事情展开,看似不动情却是饱含深情的。只有真的关心、同情民众,才能有如此炉火纯青的笔力。

四是真诚朴素而有回味的艺术美。归有光的文章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他的散文中有一类抒写友

情与亲情的,脍炙人口。他写家人情的代表作《项脊轩志》全文多叙琐事,却形散神连。此文以书斋“项脊轩”为中心,把父辈的分家琐事与对母亲和祖母的回忆,串联在一起,娓娓道来,错落有致。“其前衬以写景,其后又加以议论,前后脉络清楚,语言简练生动,头绪繁多却毫无杂乱无章之感。全文语言清新自然,刻画细节略貌取神,三言两语,即能将人物情态写活,宛然如见。”<sup>[2] (40)</sup>文章的结尾写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思人,令读者回思无尽。

又如写父女情的《女二二圻志》悼念夭折女儿二二。二二在世不足一年,归有光又时常居于山中读书,见面机会无多。归有光在抒发对二二的情感时,抓住“长女抱其妹”与“及予出门,二二尚跃入予怀中也”的场景,两百字左右的文章写得如泣如诉。最后“吾女声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见”二句,更增加了文字的沉痛。

再如写夫妻情的《世美堂后记》写继配王氏之贤惠:“余于家事,未尝訾省。吾妻终亦不以有无告,但督僮奴垦荒莱,岁苦旱而独收。每稻熟,先以为吾父母酒醴,乃敢尝酒。获二麦,以为舅姑羞酱,乃烹饪。”归有光写此文时,其妻王氏已故去十年,但其怀恋之情却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稍减,简简单单的日常道来,发自内心的真情立于纸上。汪曾祺谈及归有光的文章时,说“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做到‘无意于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他的结构‘随事曲折’,若无结构。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sup>[1] (12)</sup>与归有光以真实情感写作相同,汪曾祺也认为小说写作要真诚,“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sup>[4] (551)</sup>

语言的朴素,细节的捕捉,画龙点睛般的描写,感人至深的情感,诸多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归有光散文的特殊美学价值。而汪曾祺对归有光的评述,恰好也是评论者对汪曾祺本人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1] 汪曾祺. 汪曾祺小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2] 归有光. 赵伯陶选注. 归有光的生平与散文创作[M].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8.
- [3] 季红真. 前言[Q]//汪曾祺小说.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4] 汪曾祺. 汪曾祺自选集[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7.